

高速时代的社会断裂风险^{*}

李林艳

内容提要 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速度时代,越来越快的社会运转速度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学研究议题。信息通信技术构成了本轮经济和社会加速的“基础设施”,正是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速度就是利润的逻辑,被充分地贯彻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每个细节。围绕速度逻辑,生产和流通的基本运作模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加速的逻辑还迅速传导到日常生活当中,使社会和文化与经济活动一道加速。本文在分析高速度时代的基本特征、组织逻辑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高速度在社会结构层面可能带来的断裂风险。一方面,高速度会造成连接-脱节、调适-甩脱、流动-固着三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断裂线,另一方面,这种社会断裂趋势似乎越来越超出现有社会制度的整合能力。本文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高速度时代的社会断裂风险。

关键词 社会加速 社会断裂 风险

高速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准确断言过,“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转速度在加快。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捷自不待言,商品流通和更新换代的速度,时尚、语言乃至工作的变动速度,都越来越快。虽节

律各不相同,但发生在不同领域的共同加速趋势,却非偶然,而是一个时代的系统性特征。各个领域的加速趋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机制,背后的动力机制为何,以及不断推进的加速趋势对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学议题。

大体上看,当今时代社会系统的高速运转,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技术领域,主要表现为信息和通讯技术更新和扩散速度在不断加快;二是生产领域,组织、协调生产的效率大大提升,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周期大大缩短;三是工作和生活领域的节奏在明显加快。工作更快,移动更快,思维更快,生活更快。这种加快与技术 and 生产领域的高速度不无关系,但其关联并非那么直接和显

^{*}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研究”(项目号:13SHB00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也受到东南大学基础科研扶持项目“新道德社会学评析”(项目号:2242015S20038)的资助。

而易见,因为在技术减少特定活动的必需时间的同时,理应产生更多富余的闲暇时间,但实际上时间的稀缺性却也在增加,这本身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四是规范和价值层面,人们越来越自觉与不自觉地,把速度当成值得追求的目标,把速度与自由、生产力、效率和控制等价值联系起来。快捷、便利、瞬间体验和迅速过时,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正是基于“一切都在加速”^②,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高速度”时代。

对时间的集约化使用,似乎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特征。“速度”是近两三百年来现代性一直遵循的结构性原则,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以全方位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加速以及基本生活节奏的加快作为标志^③。但相较于现代化的其它结构性特征,如理性化、世俗化、个体化等等,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和加速特质,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在主流社会学中一直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和系统的分析。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加速不是一个匀速、稳定的过程,而是以波浪式的方式推进,通常由新技术或者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所引发。有研究认为,上一波剧烈的社会加速大体发生于1880年至1920年期间,也是那段时间及其稍后一段时期,对于速度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④。众所周知,这也是古典社会学发展的时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网络化生产组织,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加速趋势。同历史上其他的社会加速期一样,加速度的冲击波有一个由中心向边缘传递和扩散的过程。只是本轮加速过程,来势之迅猛,影响的空间范围之广,对人类社会生活冲击之剧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令人猝不及防甚至高度忧虑,这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一轮加速的社会后果予以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

作为运行原则的速度逻辑

我们称这个时代为高速时代,是因为高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组织原则,它不仅在客观意义上构成了社会系统的运作动力和机制,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主观意义上的价值和追求。这种高速的逻辑是如何生成和传导的,其动力和路径为何,

这是我们试图理解高速时代时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分析当今高速时代的逻辑和历史起点,是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革命。信息通讯技术构成了本轮经济和社会加速的“基础设施”。在工业领域,得益于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和流通的基本运作模式发生了改变。通过将知识与信息融入物质生产与配送的过程中,企业的统筹和协调能力大大加强。零库存生产、供应链管理、组织弹性和系统一体化,这些组织管理上的创新,把生产的分散化和实时整合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企业对市场动态的反应达到了实时、实地的水平。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速度就是利润的资本主义运作逻辑,被充分地贯彻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每个细节。

在这个信息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资本的游戏规则围绕着速度逻辑发生了改变。曾领一时之风骚却业已成熟的工业经济,不再是财富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它逐渐沦为这个时代黯然的配角,而知识、信息和理念的创造,则越来越成为攫取新财富的快捷通道。那些固定在空间中的物理设施(比如建筑、厂房、仓库、生产线)和大型科层组织,构成了加速过程中的累赘。它们被处置成网络中的节点,通过合同承包给那些劳动成本最低和管理最有效率的地区。那些签约的生产性企业,本身必须接受极为苛刻的生产日程表,因为其被纳入网络的条件,正在于对低成本和高速度的保证。由此,加速的动力得以从美国、西欧等核心企业传送到中国、马来西亚或巴西和墨西哥等制造业国家。寻找和打造生产和流通的“成本洼地”,这种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本的时间逻辑的分析:通过降低劳动时间到社会必要时间之下,以及让商品在生产 and 流通环节总共花费的时间低于普遍的社会周转时间。

在信息通讯技术时代,速度就是一切,它是竞争力不可缺少的成分^⑤。速度逐渐成为优胜劣汰的法则,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不再是大的吞并小的,而是快的打败慢的!为此,核心企业尽可能减去一切不必要的负重,成为“精瘦型”、“无重量”(weightless)的企业,从而能够迅速地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反应^⑥。然而,在变化多端的市场当中,对于市场的占有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短

暂。生产和周转的效率,并不是稳定和适当利润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速度逻辑要求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能够引领市场潮流,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因此,对于核心企业来说,速度不仅意味着寻找“成本低地”,还意味着打造“创新高地”,即通过对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来占领市场先机,因为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取得更高的价格和利润边际”^⑦。占领狭窄的和短暂的时间范围,以技术的前沿性应用或装置带来大量的短期利润,是当今时代企业的经营目标。当然,谁都希望一劳永逸地拔得头筹,站在潮头,但这在当代已经不复可能。再大的企业,再成功的模式,一夜之间就可能辉煌不再。换言之,在当今时代,对于任何公司而言,无论它们是谁,生产什么,都不可能免于加快创新和生产的需要。速度成为企业组织和运作的基本逻辑。

高速时代,是所有事物的加速。研发、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加速,只是快速经济的“震中”,它还把加速的要求迅速传导到日常生活当中,使社会和文化与经济活动一道加速^⑧。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很方便地把速度和加速度带入了我们存在的每一个缝隙:它不仅改变了我们互动和交流的方式,还通过手机、电邮等数字化通讯手段,把高速度的压力,从企业和组织层面传输到企业和组织中的个人,最终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格局。在高速度时代,工作很多时候都不是按照之前的日程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受到一种“网络时间”的强制,被要求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一工作,经常是临时接受的紧急任务,加班、出差,以确保整个创新、生产、流通或服务网络保持高速运转,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越来越难以计划和控制,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而失控。

“我们做事的速度(或者我们被期望做事的速度),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旧任务,现在总是被指向一个速度的开放式连续统中快的一面。我们现在正经受着对速度的崇拜,它明白无误地要求,无时不在地宣布,我们做得越快,就越好”^⑨。与此同时,个体越来越感觉到,如果不很快地学习新的技能,将被淘汰、失宠或者被解雇。速度的要求无所不在,就连电脑浏览器自动弹出的广告信息,都是:您电脑的开机速度打败了全国计算机”的百分比,或者“您的电脑未能以最佳速度运转”。

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快节奏,消费也是高速度得以持续的必要环节。今日的消费主义文化,越来越彻底地贯彻了对商品求新求异的速度逻辑,普遍表现出“嗜新症”(neophilia)的倾向。^⑩阿联酋曾经播出的“手机大屠杀”的广告,表现了消费者对新款手机的疯狂:他们用各种方法义无反顾地丢掉甚至毁掉旧手机。虽然广告并非真实,但其折射出的速度逻辑却无比真实:若旧手机不被丢掉,新款手机又能卖给谁呢?

总的来说,通过对社会 and 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加速度成为整个社会体系的核心逻辑。虽然加速度偶尔也会遭遇抵制,比如人们对慢生活、慢成长的倡导,对“让灵魂跟上”的呼吁,但与冲天巨浪般袭来的加速度相比,这些都只是容我们喘息片刻的一点涟漪。

高速时代的社会断裂风险

社会断裂,同“社会隔离”“社会排斥”“社会解体”等意义相近的概念一样,是社会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丰富传统中的一部分。关于这一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界定与本文的语境最为切近。当大部分社会成员踏上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奔向下一站,却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被永久地甩出。这种因为不能融入主流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从社会的主体结构中被迫分离出去的现象,图海纳称之为“社会断裂”^⑪。国内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辨识出了中国式的社会断裂现象。他认为,制度转轨和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断裂带和断裂群体。实际上,在孙立平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断裂,一种如下岗工人,制度的转轨导致他们当中一部分缺乏再适应能力的人,被迫从原来居于其中的主流社会体系中剥离出来;一种如从事细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真正参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因而被迫在主流社会生活的外部艰难度日。这两种情形与图海纳的社会断裂概念相一致。第三种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虽然加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但在他们身上,经济意义上的边缘和社会意义上的排斥并存,在时代的高速列车上苦苦挣扎,随时有脱离的危险。在孙立平看来,“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

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⑫。

一般而言,社会断裂是一个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概念,是经济和社会运作机制在社会成员的层级结构上所带来的后果。后文所讨论的社会断裂,是指沿着本轮加速所发生的主要经济和社会界面所出现的带状分裂。除了底层群体的被动脱离和艰难挣扎,它还格外关注在高速时代应对自如、左右逢源的某些精英群体,他们逐渐地脱离社会大众,自我游离、自成一统,甚至根据自身利益对社会大众行使操控和支配,在国家间的制度空隙中构筑自由和特权的“飞地”。因此,本文所指涉的社会断裂,是指在高速时代,部分社会成员脱离社会主体以及社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封闭、隔离、排斥的状态和过程,从而使社会运转处于失调和失控状态的一种社会境况。

当今大量有关信息技术革命、弹性生产、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文献,都讲述了一个关于速度与效率的抽象而完美的神话: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革命,生产组织模式的重组,不仅令自由竞争的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畅行无阻,无远弗届,而且还带来了“平”的社会结构形态^⑬。这一神话的脚本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其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社会现实层面得以展开,也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波助澜。

毋庸置疑,当今时代,速度逻辑正在把全世界全社会连接成一个整体,然而,从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围来看,无论是全球社会、民族国家、区域社会还是地方性社区,社会加速显然不是一个在社会成员间匀质、同步扩散的过程,而是,如前所述,首先是从核心技术和生产领域开始,然后速度法则不断由技术和生产的核心领域传递到非核心领域,由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扩散,由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进行选择性地殖民——之所以选择性地,是因为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而言并非全都有开发的价值。本文以为,恰恰是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在经济上加速和不断卷入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加速过程中围绕入场与缺席、调适与淘汰、流动与固着等逻辑发生急剧的断裂。

大体来说,高速时代快节奏、工具取向的经济

自由主义,更多地着眼于短线思维,更注重快速操作,以满足利润驱动的期望,因此很难使整个社会保持同步,从而给社会造成至少以下三种性质的断裂线:

1. 连接-脱节断裂线。这个时代,对于大多数群体而言,加入高速经济的研发、生产和流通体系,是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区域乃至全球范围来看,围绕着能否连接到高速经济,是否具备参与当前社会生活的资格和能力,能否挤上高速运转的时代列车,形成了一个社会断裂带。这种断裂可能发生于经济落后地区,主要依靠传统技能谋生的人群,譬如从事细小规模农业生产的中国农民。他们既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未受过相关的训练,甚至未曾接触过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果他们能够有一方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天地,固然能够继续他们平静而循环往复的生存方式,但似乎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存空间在开发浪潮的席卷下日趋狭窄。或许,他们的最好出路,是作为原生态的旅游景点,以供来自高速世界的人们前来观光和稍憩。但事实上,他们多数处在恶劣而乏善可陈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景观可供售卖!

2. 调适-甩脱断裂线。高速时代的生存逻辑是连接和参与到核心经济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连接本身却是不稳定的,因为高速度时代技术、管理和经济周期本身都是不稳定的。这种连接的不稳定性,需要经常性地调整姿态以适应快速的变迁。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产业以及不同的社会位置,其调适的可能和能力大不相同,而这事实上构成了目前社会断裂的第二个圈层。比如,当今世界上有大量的移民和底层民众,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地区,主要依靠体力和简单的操作技能获得一份不稳定的工作,这是他们加入高速经济体系的一种途径。然而,在高速时代,大量高效、准确而运行成本低廉的自动化设备和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代替人来从事重复、机械但却有着较高人力成本的工作。因此,那些在生产线上、在简单服务中获得生存空间的人群,时刻面临着被取代和被淘汰的风险。有时,这种断裂也可能发生在那些制造业曾经极为繁荣的地区,比如遍布全球的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由于产业转移或者产业升级,大量无法找到与自身技能相适

应的工作的产业工人,可能集体性地面临窘境。被从高速经济轨道上甩脱下来的人群,可能立即沦为“结构性多余”,此时若无有效覆盖的社会保障网,他们的生存可能陷入严重的危机。

3. 流动-固着断裂线。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中,但在高速时代,各色人等及其活动与空间的关联性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流动或可移动性是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资本,越是能够自由流动,越是可能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增殖的方式。其他也是如此。譬如在工业生产领域,技术专利和创意的可移动性,显然远大于厂房和设备的可移动性。因此形成了产业链中技术研发、品牌创立对生产制造的相对优势地位,而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由于必须在场运用自己的肢体和技能,也就相对固着在特定空间之中。事实上,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已经分为两极:“一极是享有金融霸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剩余价值占有者;另一极是大量实体经济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增加的工资劳动者大众”^⑭。在这个高速时代,最具优势的力量就是拥有高速反应能力甚至符号操纵能力的金融资本,它们流动和周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当然,目的是在每一次的流动和周转中都能获利——并日益自成一体,而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⑮。

如果说前面两种断裂机制,可能将弱势群体甩出和淘汰,那么最后一种机制,则是将少数所谓的全球精英孤立出来。这些全球精英,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资本的拥有者,还包括以信息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和某些符号分析者^⑯。我们看到,在金融风暴的裹挟之下,此类处于旋转中心的人,或者说高速度的发动者,却类似于处在台风的风眼,可能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并享用着世界上最美好之物。他们的流动性也体现出高度的“脱域性”(disembodiedness),即他们不受任何具体空间的限制,更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们置身其中的世界,覆盖了地球的所有时区,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超然置身于世界之巅的这群人,当然也游离于民族国家之外——如果需要,他们倒是非常善于利用民族国家之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个星球,按照鲍曼的说法,已经分裂为“全球化的富人”与“地方化的穷人”^⑰。全球化的富人以整个地球为活动舞台,而地方化的穷人,只能固守在特定的地方,鲜有机会去体验别样的世界。

上述的种种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高速度时代社会结构化的一种动态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成员之间在高速经济中发生断裂是必然的,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速度逻辑凌驾一切的时代,要想让每个人都做好充分准备、得到充分保护、获得充分信息、具有明确的方向感^⑱,几乎是不可能的。更让人悲观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高速经济,越来越与具有地域特点的政治、社会和组织的运作机制相脱离。结果,社会成员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集体行动的基础被打破^⑲。即便能够形成地方性的团结一致,但因所谓地方性的问题是由全球性的格局和变动速度所致,并不能从地方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原本被期望弥合裂痕的社会制度,其不稳定性也在增加^⑳,其中政治制度的萎缩格外令人忧心^㉑。当社会的离心趋势越来越超出现有社会制度的整合能力,其中蕴含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结 语

其实,高速时代的社会断裂,并不仅限于社会结构层面,也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的深层断裂,体现在微观社会关系的深刻改变,体现在社会文化的价值断裂,出现了诸如个体化和无根化等等现象,而其起因,则是高速发展所导致的时间体验的剧变。

在目前高速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即时性时间(instantaneous time)的意象,即所有人,面对这个日益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越来越需要即刻做出决定和反应。事实上,“当代的技术和社会实践所基于的时间框架,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自觉经验”^㉒。高速时代让我们体验到无数新奇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同时,我们也被连根拔起,被裹挟到一场越来越快、似乎没有希望能够停下来稍加喘息的游戏之中。

当然,如果放长了视野来看,这种态势可能还有更为深层的根源。曾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长期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文化的效应,而不是原因。这种时间饥荒文化的形成,是

因为世俗化的进程。随着世俗时代的降临,神圣世界坍塌,永恒时间观消逝,于是导致无限的世界时间与有限的个体寿命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而快速地生活,可以缩小其间的差距。越是快速地生活,越是在单个的人生历程中实现更多的选择,完成更多的事情,体验更多的新异。所以,终极而言,加速几乎是永恒的功能替代²³。但是,加速和速度并非有效的拯救途径,在疾驰而至的人生尽头,等待着的依然是虚无。重塑意义体系,或许是反思高速社会的一个起点。

当然,在这种高速旋转游戏中,不同人群的境遇可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境遇的差别,带来的就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眩晕、不适和生存意义的丧失,而是整个社会解体的风险。或许,是时候摆脱高速度带来高发展的幻觉,必须严肃反思这种被高速度裹挟的时代境况了。☹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 ②James Gleick曾以此作为一本书的副标题。见James Gleick, *Faster: The Acceleration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 ③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Ethic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Desynchronized High-Speed Society", in Hartmut Rosa & William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 Society: Social Acceleration, Power, and Modernit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8.
- ④Hartmut Rosa and William E. Scheuerman, "Introduction", in Hartmut Rosa and William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 Society: Social Acceleration, Power, and Modernit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
- ⑤Janet Lowe, *Jack Welch Speak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8, p. 47.
- ⑥⑦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 London*, Penguin, 2001, pp. 33-50 p. 21.
- ⑧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 47.
- ⑨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93, p. 19.

- ⑩Simon J. Williams, *Emotion and Social Theory: Corporeal Reflections on the (Ir) Rational*, London: Sage Publishers, 2001, p. 113.
- ⑪Alain Tourain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 Polity Press, 2007.
- ⑫转引自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 ⑬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
- ⑭栾文莲《金融与产业分离改变资本价值增殖形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7日。
- ⑮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 ⑯参见Robert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askia Sassen,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Pine Forge Press, 1994.
- ⑰Zygmunt Bauma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⑱⑲Alain Tourain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 Polity Press, 2007, p. 26 p. 27.
- ⑳参见Peter Wagner,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1994;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 ㉑Stephen Bertman, *Hyperculture: The Human Cost of Speed Westport*, CT: Praeger, 1999; John Tomlinson,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ndon: Sage, 2007; Robert Hassan, *Empires of Speed: Tim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Leiden: Brill, 2009.
- ㉒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3页。
- ㉓Hartmut Rosa & William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 Society: Social Acceleration, Power, and Modernit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简介:李林艳,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南京,211102

(责任编辑:毕素华)